

# 功效

在中国与西方思维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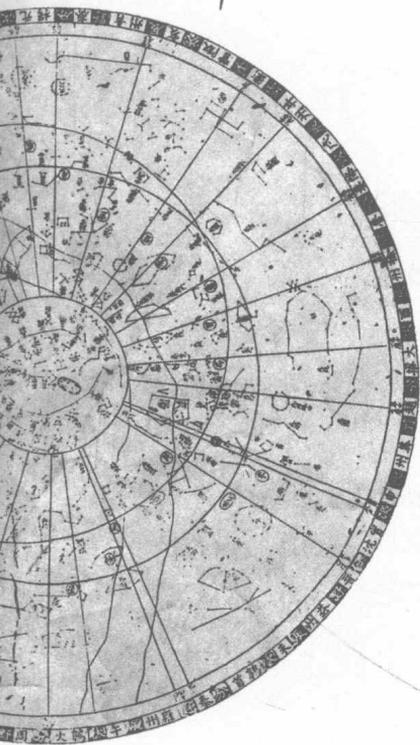
〔法〕朱利安 著

林志明 译

Traité de  
l'efficacité

François Jullie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功效

在中国与西方思维之间

〔法〕朱利安 著

林志明 译

Traité de  
l'efficacité

François Jullie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11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功效:在中国与西方思维之间/(法)朱利安著;林志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1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ISBN 978-7-301-23360-3

I. ①功… II. ①朱…②林… III. ①比较哲学-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B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292 号

*Traité de l'efficacité*, by François Jullien, published by Grasset & Fasquelle.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Grasset & Fasquelle, France.

© Grasset&Fasquelle, 1997.

书 名: 功效:在中国与西方思维之间

著作责任者: [法]朱利安 著 林志明 译

责任编辑: 王晨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360-3/B · 116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mailto: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6 印张 271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如何使得间距发挥效用？（代译序）

林志明

（台北教育大学艺术与造型设计学系教授）

“如果把差异物化或本质化，那么这将不可挽回地是一件贫乏且无生产性的事；然而，使得间距发挥效用（faire travailler l'écart），这又是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吧？我在我这些试探性论文中所作的正是如此。”<sup>①</sup>朱利安在此和我们说明了他如何构想其工作的一种方式，而其目的正是为了“认识中国并且重新发动哲学”。在其中可以发现有关“差异”（la différence）和“间距”（l'écart）的概念组构，而这是他近三十年来思想路径中的一个重大关键。我们有可能将差异和间距放置于一个互不相容的“对立”之中来理解它们（间距因而被视为差异的差异）。不过，如果我们观察朱利安如何使得一个特定的间距“发挥效用”，便会理解差异和间距之间的关系将是更复杂的，并会使得前引朱利安的声明显得更为有趣。

## 差异解释间距

在朱利安的《功效论》第五章“时机的结构”<sup>②</sup>中，他探讨了一个中

<sup>①</sup> François Jullien, *Chemin faisant, connaître la Chine, relancer la philosophie*, Paris, Seuil, 2007, p. 111.

<sup>②</sup> François Jullien, *Traité de l'efficacité*, Paris, Grasset, 1996.（下文中的页码指的是此一版本中的页码。）

国和西方思想中都共同处理的主题。这个共同主题即是“时机”，在希腊文中为 *kairos* 一词，而古代中文则以“机”这个字表达。在他对这个共同主题的讨论中，我们很快地便会遭遇“间距”这个概念。

“必须预先看见‘时机’，这在西方和中国一致，都是战略上最具共同性的要求。”(86页)然而，第一个“间距”出现了：西方人，在此尤其是指马基雅维利，“在构想这个预见之明的时候，只是为了防范负面的事物(而不是要以**具有承载力的事物**作为支撑)”。(同页)这个间距是如何产生的？为何西方人无法以正面的方式看待时机的预先设想及推测，不能看到它“具承载力”的一面呢？对于时机具如此简化、局限且片面的态度是从何而来的呢？(《远远地就看到了坏事》)朱利安使用了一个时机观中的“结构性”差异来提出解释。

朱利安的分析起始的确便存在于此一共同主题的不同思维方式。就 *kairos* 一词的原意而言，时机在西方被认为行动的“有利时刻”。它由偶然之中产生并为技艺所探索。(79页)时机在这种思维之下被视为一种可增进效力的开放性：“因为它的协助，吾人的行动得以包容于事物的发展进程，它不再是一种强行的介入，而是得以植入其中，利用其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并受到协助。”(同页)这样一个“良好的”时刻，“在时间范畴内的良善”(80页)，应该是对于行动完全正面的事物，然而在预见它之时，为何却只能以其负面的面向受到掌握呢？

在解释这个间距之前，朱利安先提出中国人对时机的不同看法来作为对照。在此，时机不再是以行动来作为考量观点，而是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变动来作考量观点。时机在此不再是由环绕行动各因素有利的联合综效所形成的“机会”，并因而“激发行动”，而是被思考为“在已经进行的过程中最适当的介入时刻”。它乃是身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之中，并且是“逐渐获得的潜势累积所形成的时刻，能释放出最大的功效”。(83页)

因此,差异是结构性的。在中国式思维中,时机实际上是双重的:在那仿佛是即兴而起的,如同机会一般的时机背后(在生自偶然中的 *kairos* 背后),出现了另一个时机,而它的位置是在时延的另一端点,也就是在已进行过程的起始之处。(83页)在这个时机的双重性思维中,首要的重点是要能看到决定性的时刻乃是处于上游的时刻,而要着重的是在其“胚胎”阶段、“初始阶段”,即能分辨出“势态中的潜力”(先机)。(84页)

这个结构性差异于是解释了面对时机的态度为何会形成间距。在西方,时机所属的时间是“偶然的,混沌的,因而是‘无法降服的’”。(90页)对于它的预见之明因而只能是一种对于可能的坏发展进行防范的准备,因为它基本上是无法为人主宰的。不然,就是反过来,以一种能量的突然激发,人们得以自我超越,并以勇气来战胜挑战。(100页)时机在此变成了“使得事功得以进行的冒险”,也就是赢得光荣的机会。(101页)在中国这边,战略家的工作乃是审慎地观察形势,进而侦测出对方的破绽。如果破绽未能出现,战略家便只作等待。这等待“联系于预见之明”,“因为破绽乃铭刻于事物的逻辑之中”。(89页)一旦对手的破绽逐渐加大,我们便能进行攻击而不必害怕和他正面交锋。(88页)时机因此能成为程序之完成的承载者。战略家与圣人相似,而不是与英雄相似,因为他必须形成虚待的态度,也就是说没有特定的注意焦点,如此才能对变化过程的整体加以体察。(91页)

## 差异构成间距

间距的一大特色便是其动态:就像是距离可以增加一样,间距可以扩展。但我们也可以挖掘、“深化”一个间距。如果我们前面所展现的,是使得间距发挥其效用的第一种方式,即是以差异来解释间距,那

么使得间距发挥效用的第二种方式，似乎便是使得它更加深化，以便更进一步地加以施展。

朱利安在这方面所使用的策略乃是比较相近的主题，但就在进行比较的同时，也更加完善地展现出间距不屈不挠的存在。比如说，就等待这个主题而言，他提醒说葛拉西安（Baltazar Gracián）笔下的政治家了解等待的重要，以及事情的谋划必须在时间之中成熟的道理。（94页）然而，间距仍是存在的，因为等待在他笔下被视为完全是正面的。葛拉西安把等待当作是一种性格上的特征，而它终究和人文主义理想中的自制及独立于周边事物变化状态相关。（同页）相对地，中国的战略家并不优先地重视等待中的缓慢；他的等待是“不疾不徐”的，因而是单纯地处于一个自有其规律的时间之中。（同页）因此，同是等待，其意义却不相同。中国战略家的等待和葛拉西安笔下的政治家的等待是不同的。由此，是思维背景中的差异维持了此一间距。因而，即使是在表面接近的主题比较之中，我们仍能看到间距不屈不挠地持续存在。而且由此，我们更能了解间距的扩展，并不是像距离一样地增加，而是在深度面挖掘。

如果中国的战略家/圣人并不将等待中的缓慢优先化，那是因为他完全不依照一个事先构想好的计划，而是只针对事态的演变加以配合。“亲密配合演变的曲线”的这种思维，也曾为20世纪哲学家杨柯列维契（Wladimir Jankélévitch）所大略构想过。对杨氏而言，时机乃是一个“独特的”“脆弱的”，并且“总是即兴出现的，未加准备的”时刻。（96—97页）但如果杨氏轻触了这个假设却未能加以发展，朱利安解释道，那是因为他的线索“不能融入任何融贯的思维之中，因而也就不能获致致密。”（97页）换句话说，即使像是在这里的情况一样，可能性已在此明白地分辨出来了却不能持续发展下去，因为如果没有比较和间距的工作，思想的基层仍未能被思维到，而此一未思状态将使得后续发展变得无法思维。我们可以说，由此一思想发展仅能轻轻擦边的情况

来看,差异在此构成了间距,甚或,使用朱利安本身的用语,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思想间的“非差异/漠然”(l'indifférence)构成了间距。

## 间距作为发展途径的异向奔流

间距在此一章节中的最后一个形象是拓扑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动态发展上的。间距受到解释、构成及深化。但它也在生成意义层面上受到发展。它便像是一种路径的插接:不同的思路曾共同插接到同一个场域上头,相互地交会,之后又再分离并各自衍生进入不同领域。

在整个章节末端,西方的时机思维被描述为一种“遇合”。但这并不是任何一种遇合,而是一种使自我得以提升的时机,一个使得事件诞生的时机。它会逾越极限并创造出破门而入的机会。它因此是自由的时机并且超越了可能性的边界。(101页)发展至最后,我们看到的西方时机观乃是“产生愉悦与冒险、惊奇和未知”。(102页)终究而言,它和“欲望比和效用更有关联”。(同页)快感的逻辑与效用的逻辑,时机意念的发展走上了不同的路径,采取了相当不同方向。西方的时机观其发展导向因而比较是英雄主义而不是战略,而中国的时机观导向的是一种自行暗自施展的功效思维。(103页)

“作哲学思维是什么?而且,以最普遍的方式来说,如果这不正是在思想中打开一个间距?”<sup>①</sup>朱利安如此宣称。诠释此处的间距(écart)一词,或许可以用法文 s'écarter 的两个意义来谈:首先,那是突破自己的局限(和自身的思想产生一个间距),同时这也是给予思想一个新的可能(和他人的思想产生间距)。我们在上文透过对于时机的不同态度中的间距,并使它施展其功效,看到差异的使用本身获得了一种生动力和复杂度。间距可以被解释、深入及打开。也许,有一天它也可能被

<sup>①</sup> François Jullien, *Chemin faisant, connaître la Chine, relancer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112.

要求超越：这不再是使得间距发挥效用，而是以间距进行工作，而这时它会被当作一种资源，以使得不同文化间真正的思想对话成为可能。<sup>①</sup>

## 后 记

在2007年10月于北京大学朱利安研讨会发表此篇短论的中文稿之后，笔者继续对“间距”意念中蕴涵的“间”思维产生兴趣，写成《“间”与崇高》一文（2009年10月《哲学与文化》第425期）。其中朱利安对“间”的挖掘被理解为一种“内在之间”，并同时具有“若即若离”和“往复来回”之义。笔者认为，这些思想元素有助于部分地解答本文最后所提“间距如何成为一种思想资源”的问题。就最后这个问题，笔者另著《间与通道》一文，即将出版。

---

<sup>①</sup> François Jullien, *Chemin faisant, connaître la Chine, relancer la philosophie*, op. cit., p. 113, 115.

## 敬告读者

当我们说某一事物有“承载力”(porteur)时,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不是说它“承载了什么”,而是绝对性地具有“承载力”?比如说,针对一个市场或一家企业的演变而言。当我们说某一因素是有承载力时,我们意味着此一因素发展前景良好,而我们可以依附其上:与其使一切依赖于我们的主动发起,我们承认某些潜势已存于情境之中,它可以被辨识出来,而我们可任由其“承载”。这个字词的用法有点模糊,或至少是一直封闭在实用的范围内,并处于语言的边界,而我们也不会梦想到要探测其逻辑。然而,在此处我们可以预感有关我们在世界中介入方式的视像存于其中;而同样的,它们和我们的理论立场难以相合,却可以给我们一个溢出它们的机会,并借此重新思考它们,以发现“效力”的其他根源。

这里指的“其他”是相对于欧洲传统而言,或至少是希腊传给我们的:它对效力的思考是由抽象得出理想形式开始,将其建立为模型,之后将它投射于世界之上,并将意志力固定于此,将其当作有待实现的目标。这个传统是事先建立的计划和行动上的英雄主义;根据我们理解它的角度,它是手段和目的,及理论—实际间关系之传统。然而,我们在最远处,也就是在中国,发现了一种学习让效果自行达致的构想功效方式;并不是(直接)瞄准它,而是(像后果般地)蕴含它;也就是不要寻求它,而是要收获它——使它自行达致结果。古代中国人对我们说,只要知道如何善用情境的进展,就能使自己受其“承载”。如果我们不计划谋略,如果

我们不劳作努力或强势运作，这并不是我们在梦想脱离世界，而是要能在其中更加成功。这个理性并不透过理论—实际的关系来运作，而是只依靠事物的演变，而我们称之为“策略性”理性。在研究它们的时候，我们会反向地问，在我们这边，即使是那些对立理念或是道德挂帅，而选择了“现实主义”的思想家——由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或克劳塞维茨——是否真的好好思考了效力。甚至，效力这意念本身是否太有限、或是太笨重了，以至于不能掌握如何使/让现实得以来临。

在这个效力的问题之下，实际上，有另一个问题逐渐浮现：它不是存有或认知的问题，如同形而上学不断提问的，也不是行动的问题（这乃是其伦理对照），而是效力的条件问题。因为问题是，效果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真实是如何实现的？

由仍然深受意志主义影响的效力问题，到连通内在底蕴的“功效”问题，我们可尝试去松动思想。这里“松动”（*décaler*）有两个意思：一是进行和（和我们思考习惯）常规有距离的移动，由一个框架移到另一个——由欧洲到中国并相互为之——这会使得我们的再现得以移动并使思想得以再次发动；另一个意思则是把所依靠的垫木（*cale*）拿起来：以便开始察觉我们不断依靠它而能进行思考的究竟是何者，但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思考。

要进行这样的松动，当然必须要重新陶铸语言和其中的立场选择：一路走来，使它偏移它原来所受承载，因而即使在我们开口前就会说的——使它开向另一个可能的可理解性，将它带向其他的资源。

## 写作目标与文献版本

这篇论文回应了本人以道德为主题的前一本论文(《莫立道德》, *Fonder la Morale*, Grasset, 1995), 后者是以对《孟子》的解读为出发。中国上古末期, 有两个思潮越来越清楚地对立着: 一方是“道德主义者”, 以公元前4世纪的孟子和《中庸》为最著名的代表; 另一方则可以被称作“现实主义者”, 他们在战国时期激烈的权力争夺中, 以反对传统和礼仪的教导作为反应。

在中国, 乃是由后一个思潮最明白地发展出有关功效的反思。但我们也会看到, 道德主义者本身, 尤其是孟子, 虽然持对立的立场, 却有不少殊途同归之处。这是因为功效的思维乃是由全体所共有, 其差异只来自所采取的“路径”[道]而已。

在战争方面, 主要探讨的文本为孙子的著作(公元前6—前5世纪?); 采用的版本为杨炳安:《孙子会笺》,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年; 及《十一家注孙子》, 郭化若编, 中华书局; 本书最好的西方版本为 Roger Ames, *Sun-tzu, The Art of Warfare*,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1993。

作为其补充的为公元前4世纪的孙臆著作, 也是一样非常有趣, 但其文本可信度相较差许多; 采用的版本为邓泽宗:《孙臆兵法注译》,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参照的版本为晚近的 D. C. Lau and Roger Ames, *Sun Pin, The Art of Warfare*,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1996。

在政治方面, 主要探讨的文本为韩非子(公元前280?—前234)的著作, 他是被不当地称作“法家”的中国独裁主义思想家中最耀眼的一

位；采用的版本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二卷。

在外交及我们称之为修辞学，但其实是反修辞学方面，主要探讨的文本为《鬼谷子》（公元前 390? — 前 320?）。目前此文本没有可信度完美无缺的版本，而原因在于一般来说，此一文本受到的稀少注意，因而除了古典的注释（尹知章、陶弘景）外，我还参照了晚近的意见：郑杰文：《鬼谷子研究》，南海出版社，1993（也参考其《能辩善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附带也参考冯作民：《白话鬼谷子》，星光出版社。

战争、权力及言说是三个主要的作用场域。相对于此，《老子》（公元前 6 或前 4 世纪?）则无法分类，因为它贯穿了这一切。我也希望能使它脱离我们在西方自以为是地将其之置入的神秘主义视野，使它能成为此一有关功效反思的基础；有关文本建立及王弼注释方面，所采用的版本为《王弼集校释》，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最好的西方版本为 Robert G. Henricks, *Lao-tzu, Te-Tao ching*,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1989。

最后，在我的文本剪辑中我偏好把“计谋”合辑撇开，比如《三十六计》之类：这一方面是为了尊重文本的历史统一性（因为这些合辑的年代明显较晚，并且也只是用格言方式重拾之前的元素），也是为了一开头便把这些反思从“中国玩意”之类的说法中脱离出来，后者太经常是我们的思想停止之处。

这本论谈，实际上并不是一本有效力的论著，而是一本有关功效的论著。如其所是，它延续了《势》（*Propension des choses*, Seuil, 《研究工作》系列，1992）一书中处理的主题，不过这次是为了走得更远，思考其框架……

# 目 录

如何使得间距发挥效用? (代译序) 林志明/1

敬告读者/1

写作目标与文献版本/1

第一章 将目光固定在模型上/1

第二章 或者,乘势而为/19

第三章 目标或结果/39

第四章 行动或转化/57

第五章 时机的结构/77

第六章 无为(而无所不为)/105

第七章 功效自成/129

第八章 由效力到功效作用/149

第九章 操纵的逻辑/169

第十章 操纵对比说服/187

第十一章 水的意象/205

第十二章 易之颂/221

译名对照表/237



---

## 第一章

---

# 将目光固定在 模型上





## 1

下面这个图示,我们曾经完全脱离它吗?以什么样的程度?甚至,我们有可能脱离它吗?我们有可能对它提出疑问吗? (“我们”在这儿是指在欧洲传统之内,作为希腊所产生的原初划分的持续者)这图示被吸收内化到如此良好的程度,我们已不再能看见它——我们已看不见我们自己。这图示是这样的:我们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形式(*eidos*),把它当作目标(*telos*),之后我们以行动来使得它在现实中实现。所有这些都是自然之理——目标、理想和意志:我们把目光固定在模型(*modèle*)上,这是我们所设想的,也是我们投射在世界上的,我们并且作了计划来实现它,我们选择在世界中进行干预,为现实赋予形式。而且,在我们的行动中,如果越能贴近这个理想形式,我们成功的机会就越多。

目标、理想和意志

这个习惯(*pli*[法文原意为皱折])在此的意思是 *prendre un pli*,即“习惯”的意思,这里涉及的是理性的习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我们是由何处持有它的。这是因为,世界的创造便应是如此(不过以创造这个角度来解释世界,这已经是重要的立场选择了……)。模型的思想自我呈现为一个模范,这情势是原初的:柏拉图对话录中的造物者只会将“目光不断地固定”在“不朽的存有”之上,并将它建立为范式(*paradigme*),以期在其作品中实现其“形式和属性”(*idéa kai dunamis*,《蒂迈欧篇》,28a);而且,“所有他以这种方式生产的,必然是美的”。